

小说叙事空间的多重维度与刘易斯的文化空间想象

张海榕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为切入点,借鉴了包括叙事学在内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和视角,并在深入分析文本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刘易斯主要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作为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性、文本内涵和文化意蕴,进而挖掘出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特质、作家的文化情感结构和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

关键词:辛克莱·刘易斯;叙事空间;地理景观;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3)05-0018-08

一、引言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用敏锐的眼光审视社会并以犀利的文笔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面貌,其创作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广泛欢迎。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从其首部作品问世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时代的更替,新的观点和阐释方法也层出不穷。据 PQDD 博士论文数据库(1947—)记载相关刘易斯的博、硕士论文共103部,其研究史清晰地显现了刘易斯整体研究的发展趋向——从20世纪20年代的“传记研究”为主到三四十年代的“讽刺艺术”的形式研究,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批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物形象分析”和“语言修辞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形式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在多种激进思潮合力作用下,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一直保持了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对过去经典作家的研究兴趣也随之发生了转移。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研究开始复兴并进入文学批评视野,刘易斯小说中的空间因素如地点要素、地点感、地理景观和空间隐喻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阿米·堪坪的“地点研究”^[1]尝试、伊丽莎白·杜克斯奥赛罗的“社区身份”^[2]初探、凯瑟林·朱芮卡的“郊区化”^[3]分析、安德鲁·葛劳斯的“风景”^[4]解读等。但上述研究者们既并未意识到空间因素在刘易斯的小说创作中是一种全面渗透和综合体现,也未意识到空间与场所已经成为刘易斯批评社会秩序和渴望改革的社会化场景。其实,刘易斯小说中的叙事空间不仅是一种

收稿日期:2013-07-2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空间书写研究”(09SJD750038)

作者简介:张海榕,女,江苏大丰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

空间再现体,还是导致近现代美国社会空间变革的重要生产性的政治力量,更是内在决定着作家叙述、分析和想象新型现代空间的表述机制。可以说,刘易斯的小说文本正是作家对这一转变空间的文化想象的再现体。

国内刘易斯的小说研究乏善可陈,主要有以下几点:(1)刘易斯的22部长篇小说中只有7部有中文译本,大量的小说还有待被译介,说明刘易斯多数作品仍未受到国内关注;(2)刘易斯相关研究成果偏少,且研究水平一般。据CNKI等数据库显示,自民国以来,有关刘易斯的评论文章才有60多篇;新世纪以来,硕士论文12篇,博士论文2篇;(3)国内刘易斯研究有几个明显的不足,包括刘易斯小说的整体研究不平衡,即出现了某部作品研究“扎堆”^①,而其他作品则基本无人问津;其小说研究受制于上世纪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仅局限于“刘易斯写了什么”,既没有理论支撑,又缺乏深度文本分析;研究进展明显滞后于西方学术界,对国外刘易斯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缺乏深入了解^②;(4)新世纪以来,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研究”视角分析到当下从叙事学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和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对刘易斯小说所做的更透彻阐释,反映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求新的努力^③。本文拟从空间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刘易斯主要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作为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性、文本内涵和文化意蕴,进而挖掘出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特质、作家的文化情感结构和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

二、叙事空间^④的理论缘起

何为小说的叙事空间?迄今为止,中外学界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M. M. 巴赫金(Bakhtin)就坚持把“空间”(topos)和“时间”(chronos)作为小说叙事的两个共同组成成分,后提出“时空体”(chronotope)^⑤这个概念考察文学中作为艺术表达形式的时空

①刘易斯有中文译本的7部小说分别是:《大街》(Main Street)、《巴比特》(Babbitt)、《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灵与欲》(Almer Gantry)、《自由空气》(Free Air)、《王孙梦》(Kingsblood Royal)和《格定·普兰尼希》(Gideon Planish),他的其他小说则鲜有人问津。其中《巴比特》和《大街》这两部小说是国内学者热衷研究的主要对象,如小说《多兹华斯》等小说至今无人问津。

②国内刘易斯研究较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有两部著作:一是2002年杨金才教授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赋予刘易斯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主要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评述了刘易斯的小说创作历程;一是2004年虞建华教授出版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一书中辟专章讨论(第六章:“乡村‘病毒’与城市‘病人’——辛克莱·刘易斯的文学历程与小说评述”),它是目前国内最具全面性和权威性的刘易斯研究述评。

③从叙事视角研究刘易斯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一是张海榕的论文“刘易斯小说的地理景观叙事与文化情感结构”(《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将空间批评与叙事学研究相结合,从空间视角分析刘易斯为了揭示现代美国社会的特征;二是杨海鸥的论文“论文化叙事——兼谈《大街》等四部小说的文化叙事特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8期)则将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叙事研究相结合,指出刘易斯小说具有“集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于一体”的美国文化叙事特征,同时兼具“现代现实主义”的文化叙事策略。

④本论文对于叙事空间理论的概述主要参照以下资料:国外资料包括有Smitten, Jeffrey. & Ann Daghistany. 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Tom Kindt & Hans-Harald Muller. What is Narratology?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Press, 2003; Joseph Frank. The Idea of Spatial Form.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Gabriel Zoran.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1984(2)。国内资料中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和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都对叙事空间作了简要介绍。本文在借鉴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将“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翻译为“叙事空间”。

⑤相关论述可以参考M. M. Bakhtin, and M. Holquist, eds., trans.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一书。

关系的内在联系。巴赫金关于叙事时空互构、互动的性质,实质是突出叙事中的空间维度,力图恢复叙事话语中对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分析。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首次用“空间形式”(spatial form)^[5]这个概念考察小说叙事中的空间维度,随之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小说理论范型,旨在探索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时间和顺序的弃绝、对空间与结构的偏爱,从而凸显文学叙事中“空间”的地位以及时间与空间之间可能产生的互动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米歇尔(W. J. T. Mitchell)在其论文《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走向一种总体理论》(“Spatial Form in Literature: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中最早对叙事空间进行了区分,他根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中有关中世纪讽喻的四层次体系,提出叙事空间的四个类型:“字面层”“描述层”“文本表现的序列原则”和“故事背后的形而上空间”^[6]。米歇尔所指的叙事空间虽突出了文学叙事中“空间”的地位,但是这样的空间划分缺乏一定的可信度,隔断了文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又走进了形式主义批评“就文本而论文本”的怪圈。1984年,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的论文《走向叙事空间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7]建构了迄今为止最具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他首次将叙事中的空间看作一个整体,从纵向维度(“地志的”“时空体的”和“文本的”)和横向维度(总体空间“空间的综合体”和“空间单位”)来建构叙事空间。很显然,佐伦的叙事空间界定的意义在于作者综合了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和米歇尔的四层叙事空间划分,凸显地理位置在叙事中的复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不足之处是,它过于强调空间的地理性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文化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更疏忽了小说中人物在空间中的地位,缺乏从个体心理视角关联小说叙事的意识。

中国学术界对中外小说叙事的空間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关注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空間化,通过梳理中国小说评点理论,彰显出中国学者的本土化研究视角,如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和《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2007)以及韩晓的《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龙迪勇的此类较为深入,其系列论文如《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2003)、《叙事学研究的空間转向》(2006)和《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2007)等不仅为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提供了英美小说空间化叙事的解读路径,其研究成果也为学者进一步走进叙事空间,倡导小说叙事的空間研究视角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照。但不容忽视的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学界“对空间叙事理论的介绍多于建构,当前还未形成系统的空间叙事理论;空间叙事理论没有形成对文本分析的有效指导;空间叙事研究缺乏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8]等等。

如何建构叙事空间的理论框架?一方面,空间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主要从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三个方面来思考空间的特性^[9]³⁹。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辩证法”以及“空间的社会生产”理论填补了空间批评理论的空白,为空间批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道。另一方面,其他理论家的思想丰富了叙事空间的理论维度,并提供了小说具体解读的路径: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一书阐明文学空间不仅是地理景观的反映,其自身就是地理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空间与地理景观的距离呈现弥合态势;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著作《乡村与城市》阐述“地理景观”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约瑟夫·弗兰克的论著《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阐发现代小说的文学叙事已从“时间顺序”中突围,在“空间秩序”中演绎,在“空间形式”中重塑文学的叙事风格。本文的理论基础既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又增加了文学特有的审美层面,对刘易斯小说的文学空间进行了界定、拓展和分类,将其小说的文学空间范化为“地理景观叙事”(物质层面)、“个体心理空间叙事”(精神层面)、“性别空间叙事”(社会层面)三个层面,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此分析刘易斯多部小说中的叙事空间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和辩证关系。

三、地理景观叙事与刘易斯的文化空间想象

从地理景观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O. Sauer)的《地理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1925)。索尔首次将“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入美国,他指出,“地理景观是对制造这一景观的文化的一种展示,因此,对一种景观的解读为地理学家们自己提供了一扇了解特定文化的窗户”^[10]。索尔的研究路径侧重于强调地理景观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印证了“地理景观”所具有的文化性属性,但较少探讨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关于文学创作、地理景观和人类生存的关系,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 1998)一书的第四章《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literary landscapes: writing and geography”)中对“什么是文学中的地理景观”作了精辟的论述:“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景观的融合,而不是视文学为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观照世界的不同方式,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11]。

虽然克朗的文学地理景观强调了地理景观与地区文化之间的关联,但并没有阐释如何透过小说文本中的地理景观解读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特性。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①这一概念,在总体上强调:文化是一个“形成与构成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对“基础”的反映,它本身就是“生产性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或“结构”,而“情感结构”始终都是一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既是一种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之中对生活特质的感受,又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可以看出,克朗的文学地理景观把地理景观深深植入文本的织物质地之中,强调地理景观与社会、文化、读者之间的互动空间,而雷蒙德·威廉姆斯对“情感结构”的认识则更为精确化。本文以刘易斯的小说《大街》、《巴比特》和《多兹华斯》中的地理景观为例,尤其是小说中“乡村”“城市”以及“异域大都市”地理景观的变化来分析作家刘易斯的情感结构,分析“刘易斯的小说”如何“赋予地理景观不同的意义”。

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Main Street*, 1920)中勾勒了乡村地理景观的三种文化形态:“诗意化”的乡村^{[12]425}(指在物理层面上,乡村地理景观已经被抹去了自然景观的痕迹,而被塑造成一个物化的、意象化的以及理想化的地理景观)、“病毒化”的乡村^{[12]255}(指在文化层面上,乡村的保守、狭隘的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思想^{[12]98-120})和“与城市对峙中”的乡村^{[12]28}(指刘易斯从自然景观层面上肯定了城市优越于乡村之处,肯定了城市生活的正面性,其目的是讽刺“乡村病毒”对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负面性影响)。三类乡村的文化形态一方面说明乡村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理空间,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蕴含着不同情感结构的文化空间,体现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间的相互较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对“乡村”地理景观的勾勒,不仅可以反映了文学自身的历史演变,而且可以体现出作家对这种变迁所蕴含的情感结构。笔者必须指出刘易斯对“乡村”的批判都作了纯粹化的文化处理,存在着有失公允之处,事实上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丑陋”和“狭隘”都同时存在,且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不断强化。

小说《巴比特》(*Babbitt*, 1922)中刘易斯侧重于书写美国城市的地理景观,并以泽尼斯城为例,通过人物巴比特的遭遇呈现出城市地理景观的更为具体、动态的三种文化形态特征:一是乡村视野下的城市意象——“巨大的城市”^{[13]78}。刘易斯反复运用“巨大的城市”“高耸的士兵形象”“高楼大厦”“庞然大物”和“迷人的城市”等意象来形容泽尼斯城,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讴歌和赞美。在

^①威廉姆斯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和有机的东西,即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他曾举例说:“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绘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内容,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参见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乡村”的背景下,“城市”显得既具有生命力又具进步性;二是城市空间形态同时兼具的两面性:它既是“银器”又是“悬崖”^{[13]1}。这两种意象不但是泽尼斯城的一种宏观意象,也是城市“主体”所面临抉择时的微观意象。这是资本主义逐步获得主导地位时期,对城市现实复杂性的文学呈现;三是“标准化”^{[13]13}的城市意象,它象征着美国城市的本质,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在城市获得绝对支配地位,另一方面还说明资本主义“福特时代”在深层次上具有的历史特殊性:“物的同质化”的历史趋势与“人的异质化”的历史境遇并存。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注入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城市建设计划和区域性管理只是空间规划的要素,空间的生产类似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城市的建筑象征了资本主义关系,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因为中心地区被商业功能占据,所以居住空间的使用才被驱逐到边缘地区)^[14]等。

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的经验无疑是现代的主要经验。然而,在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美国和世界接轨的交错地带——“异域大都市”(exotic metropolis)。这种“异域大都市”地理景观既是美国向国外过渡的地理空间,也是美国经验向国际经验过渡的文化空间。《多兹华斯》(Dodsworth, 1929)基本上是由四幅意象图片罗织而成的一幅异域大都市地理景观的图谱,这四幅意象分别是:一是伦敦的“嗅觉”意象^{[15]51};二是巴黎的“视觉”意象^{[15]110};三是柏林的“战后社会心理”意象^{[15]217};四是威尼斯的“民族潜意识”意象^{[15]226}。如果把主人公美国人山姆·多兹华斯比喻成这幅异域大都市地理景观的经线,那么这四幅异域地理景观意象则都属于纬线。经线是美国文化形成的参照,纬线是欧洲文化的种种变体,两者交织出的图案里呈现出刘易斯对于“世界的中心在何处”的探讨以及欧美文化之间的存在差异和欧美文化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解读刘易斯小说中的异域大都市地理景观意象是我们进入其小说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对异域大都市的感知和述说也隐现出刘易斯复杂的情感结构。在异域地理景观意象化的描写中,刘易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肯定美国的道德精神和自由活力的基础上,通过汲取欧洲文化中的审美与经验,提出了一种融合欧美文化于一体的理想的文化模式。

刘易斯小说中的地理景观从美国的乡村“戈镇”出发,途经中等城市“泽尼斯”,然后跨出国门走向异域欧洲大都市,最后又返回美国本土。小说中的地理景观既是人们参与空间实践的产物,也是小说文本构建的显著特点。借助于此行走路径,作家从“乡村”“城市”“异域大都市”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历史演变出发勾勒出美国现代文学具有鲜明地理景观特点的地图,这幅地图在艺术层面上表征着刘易斯小说叙事空间化的特点,他通过“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凝固”以及“时间感的消失”等叙事技巧来重新组建小说中的时空秩序,向线性时间为基准的旧历史观进行了挑战。

无论是刘易斯的小说,还是地理景观本身,都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着关于文化和地理景观的空间性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实现空间化叙事的可能性。它在探索文化与地理景观关系的同时,倡导在空间化的叙事中去把握世界,揭示存在的意义,探寻理想的美国文化。总之,刘易斯捕捉到他的时代中富有特色的地理景观片段,隐喻性地再现它们,丰富了文学地理景观的解码路径和指意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与他的时代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四、个体心理空间叙事与人物主体意识的自我构建

个体心理空间叙事和人物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是刘易斯小说叙事空间的另一重要环链。个体心理空间指具有人物典型特征的场所及其个人心理场所,它不仅是一种表征的空间,还是地理景观被赋予了个体特征的空间,充溢着人物思想、情感等个体特征,因而成为具有人物特征的表征空间。从总体上来说,刘易斯的小说人物在心理空间的再现过程中不仅仅常常被置于直面“自我”的处境中,被置于散漫的生活碎片中,而且他们总是试图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但最终却又不得不回归原先的生活轨迹,具体表现为“回归的娜拉”“寻找梦中的仙女”和“房车的启示”等隐喻性书写,不仅仅折射出一个

自我怀疑丧失稳定心理结构的主体试图逃离现实世界,但又逐步走向心理平稳的过程,而且也揭示了个体心理空间背后蕴含的美国时代精神的碰撞与兴替。

概括而言,刘易斯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关注小说中人物的自我。“内在的自我”暗指人物自我的封闭、分裂、破碎、孤独等心理状态;“外在的自我”呈现出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在世界的疏远、对立与异化关系。从文本的具体表征方式上说,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个体心理空间有着各自的特点:既有女性人物卡萝尔(《大街》中的女主角)在遭遇城、乡碰撞、挤压下自我意识的萌芽,也有男性巴比特(《巴比特》中的男主角)在城市、荒野空间的异位中,从压抑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向有意识的不断转化的过程,更有在异域空间流连、徘徊中,主体山姆(《多兹华斯》中的男主角)的欲望化书写。它们显然给小说迥异的地理景观烙上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可以说,刘易斯的小论文本既是对地理景观的描摹与再现,也同样是对小说人物心理的象征与表述。刘易斯在准确地构架一个物质上的地理景观以外,又含蓄地表现了一个承载着多重压力、充满隐喻的人物心理空间,这双层空间互为前提,相互关联。

从主题上来看,个体心理空间叙事主要探索了20世纪20年代的人应该如何建立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关系,并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实现自我。事实上,它既是小说人物面对分裂的自我进行自我解构和重构的种种努力和诉求,也是刘易斯医治“时代的痼疾”的一剂“灵丹妙药”,作家通过探究人物卡萝尔、巴比特和多兹华斯的心理空间,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的编码与重组,对沉溺于物质主义的美国社会及其前途提出了质疑,揭示了现代性空间重组——城与乡的差异、本土与异域的跨越对主体身心的影响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进一步阐明个体心理空间与主体的自我构建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叙事手法上来看,刘易斯为了真实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摒弃了整体性叙事,打破时间的顺序,消解了传统叙事的连续性、完整性,小说文本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并置结构——或将显性叙事与隐性叙事并置,或将显性空间与隐性空间的并置,或将意识流与蒙太奇的并置——多重并置结构建立起了具有空间意义的文本世界。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具有双重主题:小说的一重主题是关于特定历史时期个体心理书写的故事;另一重主题是作家对人物主体意识自我构建的探索和考察。作家借助于并置的叙事结构来对应小说人物分裂的主体和破碎的自我。刘易斯通过凸显空间与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本质联系,将空间塑造为通向自我的桥梁,让空间积极参与到作品的主题的建构与艺术创新,从而隐喻地再现了个体心理空间的一面。

五、性别空间叙事与美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刘易斯小说叙事空间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空间的探讨,它形成了刘易斯小说叙事空间的第三个维度。“性别空间叙事”直接指向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性别机制与小说文本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刘易斯在小说中探索建构理想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探索渗透到每一个具体的地理景观空间之中,既有女性主体探索乡村生活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隔,又有男性主体遭遇城市社会中男性气质的危机,更有美国企业主借助异域行旅生活,追问异域纨绔精神与美国企业精神的差异,探寻建构理想的美国男性气质等主题。

社会空间是小说空间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因小说人物总要走进社会,同社会上的各种关系进行交流。可以说,不同人物在社会交流的过程中种种行径,汇聚成一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不仅仅指涉人们的活动场所,重要的是,人物在社交场合交流中所体现出的非物质空间,譬如人物在社会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和结果等。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9]50}。它既能生产社会同时又能反映社会,因此,社会空间有时会体现为一种思想同另一种思想的交锋、一个群体阶级对另一群体阶级的压迫或反抗、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于两性的压迫,

这些都是小说中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空间里,各种权力关系得以呈现,而空间也构成了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文学作品对空间的表述和再现,展示了权力关系之间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纠缠。

从客观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性别空间不仅仅是表达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媒介,而且还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性别空间还表征了社会如何通过社会心理、城乡社会化过程、以“处所”文化为基础的历史过程以及商业文化共同建构固定的性别气质。换言之,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建立的文化机制规范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塑造了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不断延续不平等的性别规范。

刘易斯在小说中将人物活动的众多社会空间涂上一种探索人物性别认同的色彩,其目的是建构理想的美国社会,打造理想的两性关系,因此性别认同成为作品中社会空间的主题基调,这可以从四个层面得以体现: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基调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每一个具体的空间之中,这些具体化的空间或从卡萝尔在乡村空间的幽闭和限制状态出发,探索女性公共领域拓展的可能性;或以巴比特性别的含混和心理焦虑为落脚点,探讨城市空间与男性气质危机的关联;或从多兹华斯的异域旅行思考异域“纨绔精神”与美国企业精神之差异,探寻如何建构美国理想的男性气质。

从小说的社会宏观层面来看,小说中的乡村地理景观、城市地理景观和异域地理景观不仅构成了社会空间的单位空间,它们还体现了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物质空间呈现,换言之,空间是权力的载体,更是暴力的工具。性别认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主题基调的众多社会空间的集合。这个空间集合从人物的性别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角度展现出刘易斯在小说书写中试图建构理想美国社会的美好愿望。

从小说的微观层面来看,在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无一不与空间有关,而地理景观、建筑和交通工具则体现着物化的空间意识和人类的权力关系。它们背后潜藏着更深层的社会现实,它们所指涉的内涵不只是《大街》中一遮风避雨的“家庭处所”、《巴比特》中泽尼斯城的一间“办公室”,也不只是《多兹华斯》中异域大都市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它们其实是人进入社会的空间位置符号。换言之,在社会群体的心理构成中,空间符号性地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表面上看,家庭处所、办公室和旅行中的各种交通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具体而迫切的社会现实,但从抽象层面上看,这个社会现实后面所揭示的远远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房间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心理图示,是通过“房间”这个符号所表征的社会性别空间。刘易斯的小说既展现出女性人物面对幽闭的家庭环境,主体的痛苦、思索、拓展与最后的回归,也指出了男性在城市办公室的监视机制下对传统性别规范的焦虑、质疑乃至反叛^[16],更重要的是,它还试图以异域空间的交通工具为媒介探索出男性抵御规训社会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建构理想男性气质的必要性。

从小说的叙事层面来看,刘易斯将绘画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体现了他对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深刻理解。这一叙事策略具体表征为小说《大街》中景物描写、人物塑造中印象主义叙事手法的运用和《多兹华斯》中拼贴画技巧的使用。不管是由绘画艺术转化而来的印象主义技巧还是拼贴画技巧,它们都表现出刘易斯在小说创作中对绘画艺术形式的借鉴,显示出其小说创作的空间化叙事趋势,在新的层面上提升了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学内涵,赋予作品新的空间意义。

六、结 语

“空间”在刘易斯的小说叙事中具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与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暗合了当前的空间理论与文化领域的“空间转向”思潮,又兼具独特的空间叙事指向。它一方面指向刘易斯虚拟文本空间中一条直观的地理线路,从美国乡村“戈镇”出发,途径中西部城市“泽尼斯”,最后抵达异域欧洲大都市,这条线路呈现出地理景观逐步走出美国本土,走向异国他乡的地域性态势。另一方面,它又指向美

国现实社会的一幅多通道的、抽象的空间图谱,不但包含客观存在的诸多社会现象,如美国城乡差异、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欧美文化的较量、男女性别机制的社会束缚,而且还包含主观上的人的复杂因素,如自我与本我、自我和他者、自我与社会等等多重心理冲突内容,上述这些具体空间与抽象空间中所发生的运动和变化冲击着、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空间的文化想象。可以说,刘易斯的小说既是人性与社会的探索基地,又是叙事学、文化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理论的多元共存领地,呈现出小说叙事空间的多重维度与刘易斯的文化空间想象的水乳交融。

参考文献:

- [1] CAMPION A. Main street on main street: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reputation of sinclair lewis[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98, 39(1):79-99.
- [2] DUCLOS-ORSELLO E. Bonds of fellowship: imaging, building and negotiating community in St. Paul, Minnesota, 1900—1920[M].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2003:33-88.
- [3] JURCA C. White diaspora: the suburb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novel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44-75.
- [4] GROSS A.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travel, corporate expansion, and consumer culture, 1845—1945[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101-140.
- [5] 约瑟夫·弗兰克.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 秦林芬,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2-3.
- [6] MITCHELL W. Spatial form in literature: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J]. Critical Inquiry, 1980(6):539-567.
- [7] ZORAN G.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J]. Poetics Today, 1984(5):309-335.
- [8] 崔海妍. 国内空间叙事研究及其反思[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1).
- [9]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UK: Blackwell, 1991.
- [10] MITCHELL D.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21.
- [11] CRANG M.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57.
- [12] 辛克莱·刘易斯. 大街[M]. 潘庆龄,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3] 辛克莱·刘易斯. 巴比特[M]. 王永年,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
- [14] 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135.
- [15] LEWIS S. Dodsworth[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29.
- [16] THOMPSON G. Male sexuality under surveillance[M].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3:25.

A Study of Narrative Space in Sinclair Lewis's Fiction

ZHANG Hai-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In light of Henry Lefebvre's lived - conceived - perceived triad of spatial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about Lewis's narrative space from these three levels. In fact, Lewis's fiction was profuse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s" in various ways. These representations were powerfully shaped by the writer's vigorous thinking and skillful manipulation on the 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the landscape, the cultural scene,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the gender issues in American society. These intricate thoughts also find echo in contemporary spati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flows.

Key words: sinclair lewis; narrative space; landscape; cultural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 彭何芬)